

黎智的生活时代与片断经历

□ 闻立树

2001年8月18日，黎智六哥辞世，至今将届三载。他那刚毅敦厚的形体身姿，稳重幽默的言谈举止，仍然不时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数十年来的往事和旧影，恍如昨日，历历在目。

我辈嫡堂兄弟16人，以“立”字排行。黎智行六，我排十一，他长我12岁，我称他为六哥。六哥本名闻立志，是家骥三伯的三子。1941年赴延安前，使用立志二字的谐音，改为黎智，并一直沿用下来。

我们的故乡地处鄂东，在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的望天湖畔陈家岭（抗日战争中易名闻家铺）。在当地，闻氏家族是一个宗支延绵、人丁兴旺和世代书香的大家庭。祖父邦本公夫妻生育子女10人，其中五子是：长子闻家骥（展民），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次子闻家骥（黎青），湖北省方言学校法文预科毕业；三子闻家骥（巡周），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四子闻家骥（一多），清华学校毕业，留学美国；五子闻家骥，上海震旦大学预科肄业，留学法国。四房17兄弟以大排行为序，家骥伯父行二，家骥伯父行三，家骥伯父行五，家骥（一多）伯父行十一（家人习惯称他为“一

哥”、“一伯”、“一叔”），父亲闻家骥行十六。

我们的祖父闻邦本（1864—1945），后更名廷政，字固臣，是晚清秀才。他为人处世有其封建保守的一面，如重男轻女、迷信生辰八字和家长尊严等，但是并非守旧人物，尤其是在子孙教育方面。老人早年参加过“戊戌维新”活动，思想倾向于改良主义。后来隐退乡里，主持家庭新塾，课读孙辈。祖父在向后辈们传授“子曰诗云”的传统文化的同时，更有意识地灌输“经世致用”、“爱国为民”的理念。辛亥革命前，家中就能够阅读到《东方杂志》、《新民丛报》一类的书刊，较早地接受了时代潮流的影响。

祖父为人正直不阿，持家甚严。老人传承祖辈的淳朴家风，坚持“四不”家规，即要求后辈在事业上和生活中，任何时候都“不吸毒”、“不纳妾”、“不赌博”和“不贪婪”。其他祖辈各房亦是如此。这个大家庭中的三代男性，包括祖辈兄弟4人、父辈四房兄弟17人和我辈五房兄弟16人，尽管每个人的经历时代不同、政治态度相左、学识职业有别、生活志趣各异，但是百年来，人人都能够恪守这些家规。一个世代书香的封建大家庭，在世风日下的社会环境中，能够始

终坚持这样的家规，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说明传统道德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对于家庭成员形成良好品格是多么地巨大与深刻；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征程中，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仍然是一项必须常抓不懈的系统工程。

在人类社会中，教育是连接家庭与社会的特殊和顽强的纽带。青少年时代的六哥，在从书本里吸取知识营养的同时，家庭中那种诚实简朴、谦逊戒躁、尊长爱幼和兄友弟悌的淳朴风气，也在其自身品德的塑造和人生历程的轨迹中打下了深刻的印记，这与他成长为一名既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又赋予人性化品格的共产党人是分不开的。每个革命者首先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的人，在其身上不仅应当保持先辈传承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并且还应当模范地去努力实践。六哥就是这样的革命者行列中的一员，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总是努力地使自己在家庭中扮演着多重的角色：孝敬的晚辈、正直的丈夫、合格的父亲和友爱的兄长。优良传统与革命情操在这里得到了统一，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体现。

旧中国的地主阶级对待后代

教育,大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只要求后辈死读经书,守住土地家财;另一种则是接受新思潮,主张后辈向外发展,成就一番事业。祖父属于后者,在家境并不宽裕的条件下,我的父辈五人,都接受过专科以上的高等教育,一伯和父亲还经历过留学教育。

祖父非常重视对孙辈的培养教育。他主张男孩子应当走出故土小天地,到外面大世界去发展。许多年后,我听父亲讲,祖父对在老家生活的几个孙辈,特别疼爱的是六哥。一则是他为人忠厚,少言寡语,也不太爱动,当别人玩耍时,他总是站在边上观看。每当大人给小孩拿来好吃的东西时,别人都争先恐后地去拿,而他却从不去抢,有就吃,没有就在一旁看着,也不作声。祖父怕他受委屈,常常会特意给他留出一份。二则就是他读书认



少年黎智(右二)与全家人合影

真,学习努力,每次考试分数都很高。祖父有检查儿孙成绩单的习惯,每当看到立志的成绩单时,都会高兴好一阵子。老人期望六哥长大后,像一伯那样读名牌大学,出国留学,当教授,不做官。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晚辈人提起祖父,都十分敬重,同时也带着几分畏惧,六哥也不例外。1978年9月,六哥在同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刘焯先生(《闻一多评传》作者)

的一次谈话中,回忆起一段往事,仍然充满了深情。他说:“我1938年入党,毕业后组织上决定我搞地下工作,我就没有回家。过了一年多,‘皖南事变’发生,我们的组织被破坏,后来终于找到重庆南方局。其间一度我要找个落脚地,就在家里暂住。当时祖父已经知道我参加革命了。我回去见到他,他很高兴。没有责备我,反而向我讲文天祥抵抗外族入侵的故事。这次谈话出乎意料的投机,他只是嘱咐我要小心。我到延安后,他还来信。当时我的几个伯叔叫我别搞危险活动,我祖父就反对。他认为我有志气,小孩大了,各人有各人的志气。‘人各有志’四个字,我至今不忘。我到延安后寄信回家报平安,他还写信给我,并寄了20元钱。”“人各有志”这桩往事,我也曾经听六哥讲过,它是祖父对六哥也是对我们

孙辈的教诲和嘱托。这句看似平常却有着丰富内涵的语句,揭示了在民族受难的时代,一位爱国正直的老人处理国与家、公与私关系的基本准则,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一多伯父很早就离开巴河老宅,外出求学、深造和教书,加上与六哥在年龄上的差距,叔侄之间并无多少联系。但是,在特定的历史大背景和良好的家传小环境的影响和驱动下,两个人在思想上的碰撞,却产生了一段特殊的亲情。

抗战爆发后,国难当头,河山

破碎,阖家分离,天各一方。二伯和三伯等侍奉祖父母逃避战乱,由巴河移往鄂西(途中祖母在沙洋病逝),继而入川,寄籍万县。一伯和父亲两家人由武汉经鄂、湘、黔、滇诸省,西迁昆明,兄弟二人同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数年间,关山远阻,亲人音讯相疏。

抗日战争后期,一多伯父跨出书斋,投身于坚持抗战、反对独裁和争取民主的斗争行列,受到广大进步师生的爱戴。在其周围的很多进步朋友和学生中,有些是中共党员。一次,在同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马识途交谈时,马表示:在鄂西时,闻立志、立训、立玲都是我的朋友,后来立志、立训去了“那边”。一伯从而得知训、志二侄去了延安。三哥闻立训是家驩五伯的长子,比六哥大6岁。他原在重庆中共南方局工作,1941年11月,兄弟二人同赴延安。三哥对六哥影响较大,后来他在“抢救运动”中不幸去世。三姐闻立玲,即闻立林,是家驩三伯的次女、六哥的二姐。解放后,她在武汉铁路教育系统工作,现已去世。1946年初,一多伯父收到六哥从重庆托人带来的家信。带信人是中共云南省工委派往南方局汇报“一二·一”运动的情况和请示斗争策略的同志。来信十分简略,只说已到渝,除了探询他的家中住址外,并未谈及其他事情。但是,一伯却是心领神会,十分兴奋。据六哥后来回忆:“不久我收到一叔的回信。在信中,他同我倾心交谈,并以‘身在南方,心向北方’这样的语句,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热烈向往的心情。”

在此以后,一伯在致家驩五伯的信中,以明确坚定的语句,不容置疑地声明:“两侄所走路线,完全正确,关于此事,家中尽可放心。近数年来,弟对此类问题在学理上曾加研讨,并完全赞同。在实际状况方面,亦曾通过英美人士得到报

北京党史

道,结果亦皆满意,故对两径之行径,实感无上之欣慰。时代在进步中,未可以过去抹杀现在也。”这段话,今天读起来仍然令人感觉到一种言简意深、掷地有声的力量,义正情纯、论理坚定的气势充满着字里行间。这后一封信写于1946年3月30日,是迄今为止收集到的一伯生前写的倒数第三封信。三个半月后的7月15日,他继李公朴先生之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殉难。

六哥当时在南方局组织部钱瑛部长的领导下,与刘光、朱语今等同志一起,承担着指导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青年工作的重任。一伯被暗杀的次日,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在上海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将这一噩耗告诉了他。他闻讯后,悲愤万分。六哥与一伯虽然没有直接接触,但都是有着同样的心路历程而不断奋进的。六哥洞悉叔父那颗爱国民主、求索真理的赤诚之心,钦佩叔父英勇地站在反独裁、反内战第一线并以身殉志的凛然正气。

在我的藏书里,有两本书和一张报纸,经常引起我的回忆与联想,因为这同一伯和六哥都有关系。一本书是《一二·九——划时代的青年史诗》,它是1945年12月9日昆明民主周刊社为纪念“一二·九”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运动10周年发行的增刊。作者是林藪,吴晗教授作序。书名是由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省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闻一多教授题写并钤盖“一多之印”名章的。一行红字行楷书名,印在绿色草纸封面上,拙朴端正,鲜艳夺目。另一本《一二·九——划时代的青年史诗》,则是以学习出版社《学习丛书之二》的名义出版的改版本。该书封面的上半部沿用了闻一多题写的书名,但是略去了署名和印章,版式也由原来的一行竖排改成两行横排。下半部是一幅反映战士们

在战斗间隙时学习情景的木刻画。封面用红蓝白三色套印,设计精当,醒目可观。这本改版本略去了序言,增加了《历史可资借镜》一文,但是略去了作者黎智的名字。该书出版于1946年夏秋之际,可能是在香港或上海印刷的地下出版物。一张报纸是1946年4月21日的重庆《新华日报》,该报第四版专栏《青年生活》155期上刊载了《历史可资借镜——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史的介绍》,作者黎智。两本书和一篇文章的内容,都是回顾“一二·九”运动的历史过程和论述“一二·九”运动的意义、成果、特点、道路和经验的,其目的在于借鉴历史经验,以指导现实斗争,特别是为“一二·一”运动指出方向。《历史可资借镜》一文,着重分析了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青年运动中,关门主义和救亡运动残余的表现、根源和消极影响,并展望抗日战争胜利后青年运动的任务和方向,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和具体政策武装进步分子。两本书和一篇文章的出版发行过程,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反映了闻一多和黎智叔侄二人志相同、道相通的事实。经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斯人已逝,论著犹存,从而也为当代书林增添了一段佳话。

三

在我保存的几张老照片中,有一张黎智六哥和魏克六嫂在青年时代的合影,是1945年秋天两人一同由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地区调到重庆中共南方局工作时摄的。经历了56载春秋,照片已经变黄,但是人物形象依然清晰自然。

1947年冬季的一天,六哥嫂来到家里。六哥个头不高,身材结实,稳重沉着。六嫂则是体态端庄,眉清目秀,落落大方。六哥初到北平时,先是住在什刹海东边白米斜街3号高真伯母(闻一多夫人)家。

1948年3月,伯母全家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由六嫂护送去了华北解放区,六哥就到我们家来住了。当时,父亲知道六哥嫂是中共方面派到平津从事学运工作的。对外人则说是从浞水老家来的侄儿,准备报考北大,住在这里复习功课。父亲还请宿舍工役老赵去为六哥报户口,以学生身分办国民身分证。但是直到1948年11月,六哥离平赴津后,这张身分证才发下来。

中老胡同32号这座多层次的四合院建筑,当时是北京大学教员宿舍之一,总共住着20来户教授人家。我家位于大院里比较僻静的东边,距离大门不远,出入方便,也不会经常与人碰面。六哥住到这里,倒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父亲很慎重,一般不约外人到家里来,有事总是到别人那里去。由于当年在报考大学的人中,常有一些年龄偏大的,因此有人碰到六哥,经简单介绍后,也就不再细问。

我们家父母和兄弟共五口人,在两小间卧室和一间充当客厅的外屋里都放了床。六哥来后,在进门过道吃饭的方桌旁安了一张单人铁床,平常他就睡在那里,外出一般是白天。除六嫂有时从天津来我家,平时来这里找他的,只有两个人,一位是北平《平明日报》编辑王汉斌,另一位是交通银行天津分行高级职员李之楠。前者南方口音,身材精瘦,衣着朴素,行动机敏;后者北方口音,体型高大,西装革履,仪态潇洒。每当他们来时,父母亲就让我们兄弟到院子里玩,自己与来人打了招呼后,也进里屋回避。来的人说话不多,就分别离去了。解放后据六哥对我讲:1947年9月24日,袁永熙、陈琏夫妇意外被捕,平津学生运动遇到了始料未及的困难。袁是中共上海局(由原南方局调整组成)系统的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人,陈是中共党员,陈布雷的女儿,两人新婚不久。当时,



青年时代的黎智与魏克

我们还在武汉,接到上海局组织部钱瑛部长的紧急通知,急速赶往上海,会同由北平来上海汇报工作的王汉斌同志,三人乘船到天津,住在李之楠同志父亲的一所大房子里。1947年10月下旬,黎智(书记)、王汉斌、李之楠组成新的平津学委(南系)开始工作。我们三个人在北平碰头开会或过夜,都是到东城翠花胡同的一个地下党员侯裕民家里,从不到街上饭馆吃饭。总之,事事精心安排,处处谨慎小心,严格按照地下工作的纪律和规律办事。因此,没有发生过什么危险。

六哥在家时,话语不多,偶尔谈些社会上、学校里的事态和湖北老家的情况。他酷爱看书。那时我们家虽然生活清苦,父亲还是订着两份报纸:一份《世界日报》,是民营性质的,报道较为客观;一份《华商报》,是香港邮寄来的进步报纸。六哥常带回一些杂志和书籍,大多购于东华门大街的报摊和北大校部的北大文化服务社。杂志有《中建》、《观察》、《新路》、《世界知识》、《知识与生活》、《北大半月刊》等,书籍则有《豪门美国》、《前苏联纪行》、《前苏联见闻录》等。还有一本是香港出版、周觅(即周扬)编的《论文艺问题》。我从北京大学子民图书室借的《李有才板话》、《李家

要的。由于身处国统区“独立作战”的环境,遇事不可能随时向上级党组织请示报告。而对于时局事态的发展变化,又必须及时了解,清晰判断,果断决策。六哥是把读书看报作为观察社会动向和判断形势变化的一个窗口,这是在特殊环境中从事特殊工作的特殊方法。

四

魏克六嫂原名邓琼芳,四川璧山人,她在其同胞的六男二女中,排行第二。1938年,魏克在成都成德女子高级中学读书时,邀约同学多人奔赴延安。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入陕北公学学习。结业后,在绥德地区从事宣传教育等工作,其间曾遭顽军袭击受伤。解放战争时期,她在中共南方局系统从事地下工作,辗转于重庆、上海、武汉、天津等地。1947年10月后,六嫂的主要工作地区在天津,隐蔽在李之楠的父亲家里,有时也到北平来。她那一身“阔太太”的衣着打扮,既引人注目又不至于令人怀疑。同六哥“寡言少语”的内向型性格不同,六嫂则是“开朗活跃”的外向型性格。她很健谈,与人关系融洽。每当她来时,就会给我们家里带来一阵活跃气氛。

当年,父亲从天桥旧货市场买

来一辆旧自行车,我骑着上学。六哥来后,也买了一辆,有时骑着外出。当时军警经常对市民进行盘查,有意思的是:今天专查骑车的,对步行者放行;明天就拦住走路的,对骑车人则不予理会。每逢大街上设卡盘查,家里人就担心外出的六哥可能会遇到麻烦,因为他没有身分证。但是,每次六哥都平安归来。原来每次盘查都碰巧让他躲过去了:查骑车人那天,他是步行上街的;到查行人时,偏偏他又是骑车出门的。事后,我曾经好奇地向他探问其中的原因,他却轻松地说:“我运气好!”我知道,这种事可是不能碰运气的。但是,从他那种泰然处之的表情中,我却看到了一个深处险境的革命者处事乐观的心态,深刻地体会到地下工作的艰难和危险。

在工作中,六嫂同六哥一样,处事谨慎,反应机敏。她每次来平,谈完事情也不过久停留,从未在我家留宿,在北平另有临时住处。她对客观形势的变化,有很强的判断能力,并且处事果断。1948年4月,国民党当局为破坏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纠集特务流氓和不明真相的分子,在天安门召开所谓“北平市学生民众清共大会”,会后又搞什么“示威游行”。特务流氓砸了红楼西边的北大东斋教员宿舍传达室,并波及到院内的几位教授家,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愤慨。那天,我正巧在街上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跑回来时,恰好六嫂正在家里,我急忙把街上的情形对她讲了。她听完后,当时没说什么,立即离家外出。若干年后,当六哥嫂同我一起回忆往事时,还表扬了我:那天立树报告的情况,为学委及时判断情况和进行工作部署提供了帮助。

1948年“八一九”前后,国民党当局又进行大逮捕,北大红楼一带气氛很紧张。全家人都为六哥的安全担心,但是他的生活节奏还是一

北京党史

五

如既往：秩序井然，出入照常。一天，他彻夜未归，父母亲万分焦急，我也很不安心。除了两个弟弟外，三个人睡意全无，守着一盏孤灯坐了一个通宵。直到次日清晨，六哥平安踏进家门，大家的心才放了下来。原来昨天他在回家的路上，发现有人跟踪，便临时改变方向，拐进了一条胡同，甩掉尾巴后，转到别处过了一夜。

1948年11月间，六哥外出了几天。回来后，情绪比往常显得兴奋。同月下旬北平围城前夕，六哥去了天津，从此再没有回家住过。全国解放后得知：六哥曾回解放区汇报工作，接受新的任务。中共中央为了适应全国形势的发展，决定将平津两市原来分属南北两系学委的地下党组织合并，分别成立地下党北平工委和天津工委。天津工委对外称迎接天津解放行动委员会，黎智任书记，委员有李之楠、沈尔琳、魏克和王文化同志。

六哥在北平居住前后近一年。六哥嫂与我们全家的关系，远远超出了亲情的范畴。六哥同父亲之间的感情，也绝非简单的“叔侄”两字能够涵盖。可以说那是在寻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风雨同舟，休戚与共”关系的一个具体例证。



黎智(右)与胞叔闻家骊教授在一起

1949年5月，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标志着中国青年运动队伍的大会师。六哥以在“第二条战线”上领导平津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身分，父亲则以坚定支持国民党统治区青年学生运动的民主教授代表的身分出席大会，两人并同时当选为全国青联候补委员。这一事实表明：他们叔侄二人的政治态度和行动表现都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认同。事后，六哥在谈及此事时说：天津解放后，他担任中共天津市青委副书记，忙于城市接管工作和组织青年活动，全国青代会召开时，他正在随“四野”大军南下武汉途中，是在请假的情况下被提名当选的。

建国后，六哥长期在武汉市担任各级领导工作，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非常岁月。1973年9月，六哥被宣布“解放”，先后任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武钢“一米七”工程指挥部党常务书记、常务副总指挥长。他第一次进京向国务院汇报完工作，就跑到北大我们家里来，这次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叔侄首次见面，两人谈了许久。

1978年，度过“文化大革命”这场劫难的六嫂，到北京参加当年坚持地下斗争的老同志聚会，会后也

到我家中住了两天。在与我们团聚的时日子里，异常兴奋的六嫂几乎说了两天，专心致志的父亲也听了两天，大家都毫无倦意。当六嫂看到父亲坐的藤椅已经十分

破旧，回到武汉后，便特意定做了一把式样相同的，托人送到北大家中。父亲十分喜爱，生前一直坐着它。1982年4月24日，六嫂病逝。直到今天，我们还时常想起她和提到她。

六哥任武汉市市长以后，多次进京，都安排时间到北大家中来一趟，有时利用中午，更多时是在晚上。父亲晚年平时说话不多，但是每逢六哥来，总是很喜悦，不仅认真地听，说话也多了。1997年8月，父亲病重，六哥来京探望。同年11月8日，父亲辞世，享年93岁。六哥又偕同赵慧六嫂专程来京吊丧。在遗体告别仪式上，他不以领导干部自居，而是排在家属队伍里举哀并接受慰问，一切都是按照传统习惯做的。记得1983年11月，他来京参加高真伯母的丧仪时也是这样。当父亲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六哥嫂又亲手将自己积存的2000元钱，送到患病的继母手中，再一次真诚地表达了对长辈的慰问。

在家族内，黎智、魏克是我的兄嫂，而在人生道路上，则是我的引路人。在祖国大地从黑夜走向黎明的岁月里，我们曾经共同度过一段不平常的日子。当时，我只是一名初识大体但涉世甚浅的初中学生。15岁的我，敬仰兄嫂对人民解放事业的忠诚坚定，钦佩兄嫂在地下斗争活动中的勇敢机智。1949年初，北平解放，故都春回。同年9月，我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翌年5月，又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这以后半个世纪的人生旅途和政治风云中，曾经得到过兄嫂的引导和教诲。回忆往事，重温旧影，对他们在我选择和坚持正确的人生道路上的榜样示范作用，铭记于心，终生难忘。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0089)